

从言、诗、音探究声音的文学书写

Exploring the Literary Writing of Voice through Language, Poetry, and Music

王 涛 (Wang Tao)

内容摘要: 本文从概念史视角对西方文论中的“声音”问题进行梳理, 检视声音如何从兼顾物理性和精神性的媒介发展成为关于“圣言”或“大音”的神话, 并从诗与乐的角度, 探讨声音的文学书写如何从“模仿论”走向对“寂静”或“纯诗”的追求。同时借助阿甘本对于“死语言”的谱系学追溯和文学批评探讨, 置于当代书写理论所影响的语境中, 重新审视声音理论的原理性发展脉络, 为声音研究提供另一种思路。

关键词: 声音; 诗歌; 音乐; 死语言; 书写

作者简介: 王涛,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副编审, 主要研究方向为外国文学理论与比较文学。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外国文学原理研究”【项目批号: 22&ZD284】的阶段性成果。

Title: Exploring the Literary Writing of Voice through Language, Poetry, and Music

Abstract: This paper offers a conceptual-historical overview of reflections on “voice” in Western literary theory. It traces the evolution of voice from a medium encompassing both physicality and spirituality into the notion of “Word” or “Voce.” By examining poetic and musical representations, the study explores the shift from mimetic theories of voice to a transcendental pursuit of “Die Stille” or “Poésie Pure.” Drawing on Giorgio Agamben’s genealogical investigation of “dead language” and his literary-critical insights, the paper reconsiders the foundational development of voice theory within the contemporary context shaped by writing theory. It aims to offer an alternative theoretical trajectory for current research on voice.

Keywords: voice; poetry; music; dead language; writing

Author: Wang Tao is Associate Research Fellow at the Institute of Foreign Literatur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His academic research focuses on foreign literary theory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Email: billow125@263.net).

声音与书写、图像一样，均为表达意义的符号，如何从概念史和当代理论语境的角度看待它与文学书写之间的关系，是外国文学学科值得探讨的原理性问题。从古希腊哲人对声音的初步区分，到基督教神学思想中对于“圣言”的阐释，再到现代诗学对“寂静之音”“纯诗”与“死语言”的反思，对声音的探究始终处于物理性与精神性、诗学模仿与存在显现的张力结构之中。哲学、神学、诗学与语言理论对声音的不断讨论，也构成了一条复杂而连续的思想谱系。本文试图通过哲学、神学与诗学文本中对声音探讨的思想脉络进行梳理，阐释文本背后的问题意识变迁，重新思考声音在思想史中变与不变的理论意义。

一、声音的物理性和精神性

古希腊时代，柏拉图在《泰阿泰德篇》（*Theaetetus*, 369 BC）中讨论感觉和流变学说时，提到了声音作为运动产生的感觉。¹ 亚里士多德则更进一步，在《动物志》（*History of Animals*, 公元前4世纪后期）中仔细区分了声响（*psógos*）、声音（*phōné*）与言语（*diálektos*）。虫、鱼之属只能依靠体内气息、振动或鳃的摩擦发出声响，海豚、鸟类发出的虽然可以称为声音，但只有用喉、舌、唇等器官的人类才能发出清楚的声音，亦即言语。² 其《政治学》（*Politics*, 325 BC）也区分了动物的声音与人的言语，认为独有人类具备言语的机能。³ 《论灵魂》（*On the Soul*, 350 BC）中更是强调声音是一种由有灵魂的生物发出的。⁴

而在《诗学》（*Poetics*, 347 BC 或 335 BC）中，对于同样被归为“诗”的悲剧，亚里士多德强调其媒介是“包含节奏和音调[即唱段]的语言”（63）⁵。换言之，悲剧的六大成分中属于媒介的言语（*lexis*）、唱段（*melos*）均与声音直接相关。而《解释篇》中那句“语音就是灵魂中的感受的符号”（47）更是明示了声音在亚里士多德心目中的精神性。

斯多亚学派中不少学者继承了亚里士多德声音理论的物理层面观点，甚至认为“辩证法理论始于关于声音的论题”（拉尔修，《名哲言行录》328）。其中，巴比伦的第欧根尼（*Diogenes of Babylon*）在《论声音》（*On Voice*, 公元前2世纪前半叶）中提出，“动物的声音仅仅是由某种冲动而引发

1 参见柏拉图：《泰阿泰德篇》，《柏拉图全集》中卷，王晓朝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369-370页。

2 参见亚里士多德：《动物志》，《亚里士多德全集》第4卷，苗力田编，颜一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36页。

3 参见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8页。

4 参见亚里士多德：《论灵魂》，《亚里士多德全集》第3卷，苗力田编，秦典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52页。

5 本文有关《诗学》的引文均来自亚里士多德，《诗学》，陈中梅译注（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以下引文仅标注页码，不再一一说明。

的空气振动，而人的声音（……）是出于某种意图的表达”（拉尔修，《名哲言行录》328）。在第欧根尼和克律希珀斯（Chrysippus）等人看来，普通的声音仅仅是一种“鸣叫”（noise），只有人类的词语（lexis）是有机组织起来的声音；换言之，属于人类的声音是由理性（logos）塑造的。¹在这里，斯多亚学派实际上已经将对声音的讨论从物理现象转向声音作为理性具象化的外显问题，并在亚里士多德的符号从词语到心灵感受、再到事物的结构中，加入了一个“可表达性”（λεκτόν，又译“谓述”或“所指物”）——它是可以被理性所理解的命题内容，在逻辑上可以被判断为真或假，词语要先指向“可表达性”，然后才意指相应的外部事物。²

斯多亚学派的这一发展深化了对古希腊思想中关于理性与语言的思考，也为被视为符号学理论框架的初步构建者奥古斯丁（Augustine）开辟了道路。比如他在《论教师》（*On the Teacher*, 389）中就曾明确提出，“符号指示的不是别的符号，而是我们已经同意称为‘可指示的’事物”（《论秩序》171）。同时，奥古斯丁在多部著作中展现了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二元对立观点。在这种可以被称为“物象二元”的观念中，物质世界是暂时的、不完美的，而精神世界是永恒的、完美的。这种思想连同奥古斯丁的声音（vox）观，在其《论三位一体》（*The Trinity*, 399-420）对基督教“道成肉身”思想的阐释中得到了综合的诠释。奥古斯丁在讨论“圣言”（Word）时以“鸣声在外的言乃是明亮于内的言的符号”对“内在之言”和“肉体的声音”做了区分，强调“我们的言变成了声音却并不就等于声音，神的圣言化身成人，却不可想象它就等于肉身”（418）。因而，声音虽然作为符号可以指向不可言说的神圣真理，但其本身却并非真理的载体，唯有通过信仰引导，声音才能成为神圣真理的媒介。

奥古斯丁为声音提供的神学范式直到德国路德宗新教神学家雅各·波墨（Jakob Böhme）的时代仍然在得到继承和发展，波墨在他的《万物的签名》（*Signatura Rerum*, 1621-1622）中提出，万物的内在皆通过外在形式来映射内在本质或者内在生成法则，以成为其“签名”。在波墨看来，声音既可以视为神圣意志的“签名”，也可以说是神圣意志振动的形式；因为上帝正是通过“圣言”（Logos）的振动创造世界，并将宇宙视为“神圣声息”（Divine Voice）的乐器，人类则需要通过“灵性直觉”才能解码自然中的神圣声息。³波墨显然没有将声音视为一种纯主观的心理现象，而是既强调声音与气息、运

1 参见第欧根尼·拉尔修：《名哲言行录》，徐开来、溥林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29页。

2 参见第欧根尼·拉尔修：《名哲言行录》，徐开来、溥林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26-328页。

3 参见 Jacob Boehme, *The Signature of All Things*, translated by John Sparrow, revised for the 1781 William Law Edition, *The Works of Jacob Behmen, The Teutonic Theosopher IV*, London: M. Richardson & Robinson, 1781, 9-11, 59.

动的密不可分，又重视声音与理性、逻各斯、意义、神性的同源。而当他将万物比作神性的签名时，则是在讨论每一个存在物的本性外显，声音作为其中一种更为重要的签名，也就是自然、神性进行自我言说的方式。

及至启蒙时代，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在《论语言的起源：兼论旋律与音乐的模仿》（*Essai sur l'origine des langues, où il est parlé de la mélodie et de l'imitation musicale, Essay on the Origin of Languages [Where It Speaks of Melody and Musical Imitation]*, 1754-1761, 1781）中开篇明义地提出，“言语（speech）区分了人与动物”（卢梭 1），继而强调人类语言最初是通过“voix”（人声、言语）表达的¹，卢梭强调这种声音天然承载情感，与激情（passion）直接关联。²因此最初的语言是象征性的，通过声音的韵律与音调传递情感，而非通过逻辑符号传递概念。³而当声音的核心价值被卢梭定位为表达和激发人的自然情感时，声音的优先性于这位启蒙时代的理论家，也就不再是服务于神学真理，而是源于人最本真的情感冲动，声音因此成为连接理性与人性的介质，声音问题被世俗化了。

但是，这并不真的意味着卢梭对古希腊至奥古斯丁思想的背离。相反，他不过是一个看似离经叛道的继承者。甚至于后世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批判中，在非表音文字向表音文字挑战的时代里，卢梭“无疑是笛卡尔和黑格尔之间，唯一或者说第一个提出了整个时代所隐含的文字还原主题或文字还原系统的人”（德里达，《论文字学》122）。卢梭这种声音优先的思想，同样也体现在《论语言的起源》关于诗和音乐的论述中：“诗、歌曲、说话有着同一个源头”，“人类说的第一个故事、第一次的演说、第一部法律，都是诗，诗早于散文，这没有疑义，因为激情先于理智。音乐也是这样，最初的音乐不过是旋律，旋律不过是言语的声音变化”（85-86）。这是因为，言、诗、乐与西方思想史对声音讨论是有着密切相关的思想脉络的。

二、声音的诗学模仿与诗性静默

自柏拉图起，音乐与诗歌的声音便被视作深刻影响灵魂、情感与道德的工具，因为柏拉图认为这二者皆遵循“模仿论”原则，只不过大部分诗歌在他看来都需要进行审查、删改甚至驱逐，才能培养出对善的理念的追求。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同样秉持“模仿论”，他指出：“史诗的编制，悲剧、喜剧（……）音乐，这一切总的说来都是模仿”，进而概括为

1 voix 源自拉丁语“vōx”，侧重于指称人的语音，引申有呼叫、声调、发音、方言、语句等。参见谢大任编：《拉丁语汉语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585页。

2 参见让-雅克·卢梭：《论语言的起源：兼论旋律与音乐的模仿》，洪涛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4-15页。

3 参见让-雅克·卢梭：《论语言的起源：兼论旋律与音乐的模仿》，洪涛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8-19页。

“艺术都是凭借节奏、话语和音调进行模仿”（27）。与柏拉图将诗、乐的模仿贬低为“影子的影子”不同，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人和动物的一个区别就在于人最善模仿，并通过模仿获得了最初的知识”，“每个人都能从模仿的成果中得到快感”（47）。“它的模仿形式是借助人物的行动，而不是叙述，通过引发怜悯和恐惧使这些情感得到疏泄”（63），亦即得到“净化”（Katharsis）。

斯多亚学派和奥古斯丁对于诗歌、音乐同样持有一种“模仿论”。如在第欧根尼·拉尔修（Diogenes Laertius）的《名哲言行录》（*Lives and Opinions of Eminent Philosophers*, 3世纪前半叶）记录中，提及一些斯多亚派学者认为“诗歌就是一种诗性表达”，“它具有格律或节奏”，“是对神事和人事的表达和模仿”（330）。在这里，声音的形式特征本身就成了诗歌意义生成的机制。且自斯多亚学派至奥古斯丁，他们都重视诗与乐的工具性和道德教化作用，肯定合乎自然法则、宇宙理性（逻各斯）、神圣秩序、有助于培养美德的诗与乐，批判非理性的激情，警惕纯粹取悦感官的引用的诗与乐。如奥古斯丁在《论音乐》（*On Music*, 387-391）中将音乐视为宇宙和谐与神圣秩序的反映，能引导灵魂向往上帝，并强调理性判断在感知音乐和谐中的核心作用。¹

到了波墨的《万物的签名》中，诗歌也如同万物一样均是神圣语言的回声或片段，亦即上帝内在本质的外显。但波墨的著述中还经常出现各种音乐与神学之间的类比，如用乐器对人与圣言真灵之间关系的类比——“签名依一切本质的本质至为精巧地构成；人所缺少的只有敲击乐器的智慧大师，那就是永恒至高力量之真灵。若这真灵在人心智中被激活，涌动作为，奏响人体形式的乐器，形式也将借言语之声显明：正如其乐器在化身成形之时所设的那样鸣响”（10）²

波墨对于声音和音乐的讨论，虽然还是与柏拉图至奥古斯丁遵循的模仿论神似，但已经从“模仿”转向对和谐的神圣原型秩序的“应和”，对内在神圣理论的“显化”，以及对万物的“签名”中内在神圣“印记”的揭示。但若说这种理论构成了对古典声音模仿论的反拨，却为时尚早。波墨的《万物的签名》中值得关注的还有他关于“哑默”（*Stille/stumm*）的讨论：

凡论及上帝的一切言说、书写或教导，若缺乏对签名的认知，皆为哑默且无理解的（……）如果灵向其开启签名，便能理解他人之言谈，更

1 参见奥古斯丁：《论音乐》第6卷，石敏敏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第181-186页，第197-201页。

2 凡未特殊注明，引文均出自笔者拙译。本节有关《万物的签名》的引文均来自 Jacob Boehme, *The Signature of All Things*, translated by John Sparrow, revised for the 1781 William Law Edition, *The Works of Jacob Behmen, The Teutonic Theosopher IV*, London: M. Richardson & Robinson, 1781. 以下引文仅标注页码，不再一一说明。

能理解灵如何通过原理从本质中在声音中借由言语自我显现。(9)

签名或形式并非灵本身，而是灵的容器、承载者或匣盒，因为签名存在于本质中，恰如静置的琵琶，实际上是一种哑默之物，但如果它被演奏，那么它的形式以它所处的形式和调子，以及它所设定的音符得到理解。同理，自然的签名在其形式中本质上是哑默的；就像备好的乐器，由意志的精神演奏；精神触动哪根弦，弦便会按其属性而鸣。(9-10)

对于波墨的这种表述，或可做如是理解：在一切存在之前，是神的“哑默”状态，也就是说，神尚未自我显现、尚未“言说”、尚未创造世界之前一切皆是寂静。神从“哑默”中通过一种内在的“渴求”或“愤怒”产生自我分化，这种张力最终导致“圣言/道”(Logos)的爆发——神的“言说”(创造)。因此，语言(神的道)诞生于“哑默”的痛苦张力中。在波墨看来，人的语言无法触及神性的本源哑默，所以真正的神秘体验是回归一种“神圣的无知”，在沉默中与神性合一。

波墨这种对于“哑默”的关注，首先直接影响了德国浪漫派的诗学主张，诺瓦利斯(Novalis)的《夜颂》(“Hymnen an die Nacht”, 1800)中，便有静默的夜，以及于不可见、不可言说中可以感知真理的诗韵。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论语言本身与人的语言》(“Über Sprache im Allgemeinen und das Wesen der sprachlichen Symbols”, 1916)一文中也有关于精神性语言的无声表达的讨论：“事物的语言是不完美的，它们是无声的”(269)。这一条关于语言可能并非始于发声，而可能开始于沉默的思想脉络，在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的《语言》(“Die Sprache”, 1950)一文的“寂静”(die Stille)处得到了承接。在海德格尔看来，寂静并非无声，而是语言的本真状态，它通过“区-分”(Dif-ference)将物与世界带入其本质的“亲密性”中，使二者既分离又统一。这种“区-分”是动态的召唤，通过“静默”将存在者聚集于存在的敞开性中，形成语言的本源——“寂静之音”。海德格尔强调，语言并非人的工具，而是“寂静之音”通过人的言说得以显现。如诗歌这种的人的言语是对寂静的“应合”，而非主动创造。在他看来，“本真的诗从来不只是日常语言的一个高级样式，即旋律。而毋宁说，日常言谈倒是一种被遗忘了的、因而被用滥了的诗歌，从那里几乎不再发出某种召唤”(24)。

海德格尔与波墨都将某种“静默”视为更本源的状态，两人都强调语言/道说是从本源的“无”中爆发或涌现出来的，接近本源都需要沉默，所以倾听也就更加必要。但与波墨的“哑默”带有的强烈神学-宇宙论色彩不同，海德格尔的“寂静”是一种存在论-现象学的概念，是存在(Sein)自身的运行方式，强调存在的自行遮蔽-解蔽的运动。或许可以将海德格尔的“寂静”视为对波墨“哑默”的去神学化、存在论化延续。

相比之下，法国诗人保尔·瓦莱里(Paul Valéry)早于海德格尔20余年的“纯

诗”理论则更倾向“从噪音世界中辨别出音的体系或世界”（瓦莱里，“纯诗”303），亦即追求诗歌语言摆脱实用、指涉、情感等非诗因素的纯粹状态，即“纯诗”（Poésie Pure）。在瓦莱里看来，诗歌的本质在于语言形式本身（声音、节奏、韵律、意象的组合）所产生的独立于日常生活之外的意蕴。这种“纯”的状态是一种理想极限，诗人需要通过如数学般精确的、高度自觉的技艺才能接近它，需要从语言的杂沓中提炼出“无实用价值”的纯粹声响，使声音和意义通过和声关系与意义关系的完美契合而形成自足秩序。

可以说，瓦莱里的“纯诗”和海德格尔的“寂静之音”都在一定程度上对声音、诗歌的传统模仿论逻辑进行了颠覆，试图剥离诗歌对现实指涉、情感宣泄或道德说教的工具性，转而追求语言、声音本身的自主性，探索比日常语言更本源的领域。只不过瓦莱里追求的是诗歌的某种理想状态，而海德格尔的目标是存在的“无蔽”。

三、死语言、声音神话和书写

20世纪意大利语文学家詹弗兰科·孔蒂尼（Gianfranco Contini）曾指出，意大利颓废主义诗歌代表诗人乔瓦尼·帕斯柯利（Giovanni Pascoli）的诗学中潜藏着一种对“死语言”（la lingua morta）的追求（qtd. in Agamben 62）。而意大利当代理论家吉奥乔·阿甘本（Giorgio Agamben）则在一系列著述中，结合帕斯科利的诗歌实践，对此观点进行了深入探讨。阿甘本关于“死语言”的理念，不仅可与瓦莱里的“纯诗”及海德格尔的“寂静之音”形成对话，也勾勒出一条相关的理论史脉络。

在对古代思想家关于死语言的探讨中，《语言与死亡：否定之地》（*Language and Death: The Place of Negativity*, 1982）中，阿甘本首先追溯至奥古斯丁。奥古斯丁在《论三位一体》中假设，若有人听到一个他不认识的词的声音，如“metheglin”，他会知道这是一个符号，即它意指某个东西，而不仅仅是个杂音，必然会有意无意地去寻找这个词的意义，因为“当他认识到这不只是一个口头声音而且是一个符号时，他就想知道得彻底；而符号除非被知道了它是何物的符号，是算不上被彻底知道了的”（262）。对奥古斯丁来说，对于这种处于声音和意义之间的未知词语的体验，就是一种对于求知的热爱的体验。

阿甘本继而发现，11世纪的思想家高尼罗（Gaunilo）在对中世纪神学家、经院哲学家安瑟伦（Anselmus）“上帝存在”论证进行反驳的过程中，对语言符号与存在关系也进行了质疑，认为可能存在一种对于只存在于声音自身之中的思想的体验，即一种还未意指任何明确的意义却驻留于声音自身的思想。¹

1 参见 Gaunilo, “Gaunilo’s Reply on Behalf of the Fool,” *Monologion and Proslogion with the Replies of Gaunilo and Anselm*, translated, with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Thomas Williams, Indianapolis/Cambridge: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Inc., 1995, 123.

阿甘本认为，高尼罗的观点为“思考声音本身”的观念“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思想领域，它指示着一种尚未抵达某种确定性意义之前的话语情境的纯粹生成”（Agamben, “Pascoli” 72）。

随后，阿甘本梳理了唯名论思想家洛色林（Roscelin）等被认为发现了“声音的意义”的11世纪思想家，并在“声音的气息”（flatus vocis）中找到了黑格尔“绝对精神”（Geist）的第一次显现。提出思考声音本身便是“旨在思考最为根本的普遍性：存在”，而“存在，与‘绝对精神’一样，作为一种普遍性寓居于声音之中，揭示并展现着语言的生成”（Agamben, “Pascoli” 73）。

阿甘本进而指出，在语言生成的场域中，动物性的纯粹声响（phoné）往往被视为必须被移除之物，有意义的话语方能生成。这种与纯粹声响相区分的人类声音，被他称为大写的声音（Voce）。由于它是那种“不再存在”的声响和“尚未到来”的意义，便必然构成一个否定性的维度。从而，存在的意义在其源初之处便往往只能用一种带有纯粹否定性的“大音”（Voce）来揭示。例如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开篇便展示了一个带有否定性的辩证过程：

在语言中我们自己直接否定了我们的意谓（……）而语言仅仅表达这种真理所以要我们把我们所意谓的一个感性存在用语言说出来是完全不可能的。

（……）纯存在不是一种直接的东西，而是一种以否定性和间接性为本质的东西，因而它不是我们所意谓的存在，而是具有抽象性和纯粹普遍性和规定的存在。（66）

阿甘本认为：“在黑格尔和海德格尔的哲学中都存在将声音界定为原初否定性维度的表述”（阿甘本，《语言与死亡》77）。在笔者看来，这种“大音”的逻辑同样可以用来解读前述的西方思想中对声音进行的追问，以及由此提出的许许多多表面上不尽相同的概念。

回到关于“死语言”的讨论，阿甘本认为帕斯柯利的诗歌就极佳地展现了死语言的诗学和拟声诗学。¹在诗歌中，帕斯柯利常常使用一些读者可能不认识的词语，如已经不再使用的生僻词和所谓“方言”和对动物声响进行模拟的拟声词，且他如此做却并不希望被理解。在《帕斯柯利与声音的思想》（“Pascoli and the Thought of the Voice”）一文中，阿甘本提出，这些词语的使用“表明语言离开其语义的维度返回源初的纯粹意图（不仅仅是意指纯粹的声音，更是意指那些作为语言和思想的单纯声音）”（Agamben, “Pascoli” 67）。

¹ 参见 Giorgio Agamben, “Pascoli and the Thought of the Voice,” *The End of Poem: Studies in Poetics*, translated by Daniel Heller-Roazen,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66.

斯多亚学派巴比伦的第欧根尼就曾表示，“词语是书写出来的声音”（拉尔修 328）。古代的文法学（*grammatica*）在研习声音的过程中产生，但当时作为纯粹自然声响的声音并未被纳入文法学体系。因为古代的思想者区分人类的声音与动物的声音时，人类的声音往往是清晰分节的，动物的声音则往往是混乱的、难以模拟书写的。而在阿甘本引用的狄奥尼修斯的著作（实为其著作的古代注文）中，“拟声词”被巧妙地设定在分节与不分节、可写与不可写的中间地带。¹ 引文中形容蛙叫和猪叫的拟声词便与帕斯柯利诗歌中的许多拟声词神似。阿甘本据此提出，动物的拟声词并非纯粹的自然声音，却可以被纳入书写，读者识其音却不知其意。加上帕斯柯利诗歌中许多所谓的“方言”，亦即死语言，都共同指向了文字化的声音。

因此，阿甘本才会提出：“字符才是死语言诗学和拟声诗学，死的语言和死的声音汇聚为一的地方。只有在字符中，依靠字符，才能捕捉和表达出在中世纪的所谓诗歌誊写意义上的对语言的最恰当体验；在那里，他可以在语言再次沉沦为声音和死亡的瞬间将其捕获，也是在那里，声音自纯粹的音响中浮现，没入（死去化为）意指行为”（Agamben, “Pascoli” 70）。书写的字符，既是声音的“可书写形式”，又是其死亡隐喻。这种让死去的声音在书写、文法中重获生命的操作，可以视为阿甘本对于西方思想传统中“声音神话”的一种批判。

古典时代关于声音的讨论似乎始终在追问：“声音是表达什么的媒介？声音在模仿什么？声音如何表达意义？”但随着对于声音超越性内在的不断追问，现当代思想关注的核心逐渐转向“意义如何在声音中产生”，或“意义如何在声音之前发生”，甚而，声音本身开始被悬置，理论家们的探究也逐渐从可听见的声音，转向静默的声音，抑或追求日常世界杂音之外的纯粹声音，事物本身无声的表达。所以当“哑默”转向“寂静”或“纯诗”，并最终转向“死语言”的讨论时，并不意味着对声音的探讨走向了它的终结和反面，声音并不是简单地被去神学化、去神话化了，而是在不断被推向其发生之前的源初位置，思想也因此不断接近语言发生场域和否定性根源。阿甘本的思想甚至将对声音的探讨推向了一个看似与声音中心的传统相悖的结论：声音有可能是在书写中被冻结、延宕后，才再度成为被思考的对象。当然，这种思想并非主张书写取代声音成为中心。而当拟声词、生僻词、方言、无法确定其指涉的音节、语义的悬置出现在包括文学和诗学的书写中时，也不再意味着表达和交流的失败，而是可以在文学上得到重新评判。这种思考无疑为重新思考声音，重新理解现代诗歌与实验写作提供了一种不尽相同的思路。

1 参见 Giorgio Agamben, “Pascoli and the Thought of the Voice,” *The End of Poem: Studies in Poetics*, translated by Daniel Heller-Roazen,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68-69.

Works Cited

- Agamben, Giorgio. "Pascoli and the Thought of the Voice." *The End of Poem: Studies in Poetics*, translated by Daniel Heller-Roazen.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P, 1996.
- 吉奥乔·阿甘本:《语言与死亡:否定之地》,张羽佳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
[Agamben, Giorgio. *Language and Death: The Place of Negativity*, translated by Zhang Yujia. Nanjing: Nanjing UP, 2019.]
- 亚里士多德:《范畴篇 解释篇》,聂敏里译注。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
[Aristotle. *Categories and On Interpretation*, translated and annotated by Nie Minli.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96.]
- :“动物志”,《亚里士多德全集》第4卷,苗力田编,颜一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
[—.“Historia Animalium.” *The Complete Works of Aristotle* Vol. 4, edited by Miao Litian, translated by Yan Yi. Beijing: China Renmin UP, 1990.]
- :《诗学》,陈中梅译注。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
[—.*Poetics*, translated and annotated by Chen Zhongmei.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96.]
- :《政治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
[—.*Politics*, translated by Wu Shoupeng.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83.]
- :“论灵魂”,《亚里士多德全集》第3卷,苗力田编,秦典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
[—.“On the Soul.” *The Complete Works of Aristotle* Vol. 3, edited by Miao Litian, translated by Qin Dianhua. Beijing: China Renmin UP, 1990.]
- 奥古斯丁:《论秩序:奥古斯丁早期作品选》,石敏敏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
[Augustine. *On Order: Selected Early Works of Augustine*, translated by Shi Minmin.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2017.]
- :《论音乐》,石敏敏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
[—.*On Music*, translated by Shi Minmin.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2021.]
- :《论三位一体》,周伟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
[—.*On the Trinity*, translated by Zhou Weichi.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5.]
- 本雅明:“论语言本身与人的语言”,王广州译,《本雅明文选》,陈永国、马海良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263-278页。
[Benjamin, Walter. "On Language as Such and on the Language of Man." Translated by Wang Guangzhou. *Walter Benjamin: Selected Writings*, edited by Chen Yongguo and Ma Hailiang.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1999. 263-278.]
- Boehme, Jacob. *The Signature of All Things*, translated by John Sparrow, revised for the 1781 William Law Edition. *The Works of Jacob Behmen, The Teutonic Theosopher IV*. London: M. Richardson & Robinson, 1781.
- 雅克·德里达:《论文字学》,汪堂家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22年。

- [Derrida, Jacques. *Of Grammatology*, translated by Wang Tangjia. Shanghai: Shanghai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22.]
- Gaunilo. "Gaunilo's Reply on Behalf of the Fool." *Monologion and Proslogion with the Replies of Gaunilo and Anselm*, translated, with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Thomas Williams. Indianapolis/Cambridge: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Inc., 1995.
- 耿幼壮: "诗歌的终结与见证的不可能性——论阿冈本的诗学思想", 《外国文学评论》1 (2010): 83-94。
- [Geng Youzhuang. "The End of Poetry and the Impossibility of Testimony: On Agamben's Poetics." *Foreign Literature Review* 1 (2010): 83-94.]
- 黑格尔: 《精神现象学》, 贺麟、王玖兴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1年。
- [Hegel, G. W. F. *Phenomenology of Spirit*, translated by He Lin and Wang Jiuxing.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81.]
- 马丁·海德格尔: "语言", 《在通向语言的途中》, 孙周兴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5年, 第1-28页。
- [Heidegger, Martin. "Language." *On the Way to Language*, translated by Sun Zhouxing.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05. 1-28.]
- 第欧根尼·拉尔修: 《名哲言行录》, 徐开来、溥林译。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年。
- [Laertius, Diogenes. *Lives of Eminent Philosophers*, translated by Xu Kailai and Pu Lin. Guilin: Guangxi Normal UP, 2010.]
- 柏拉图: "泰阿泰德篇", 《柏拉图全集》中卷, 王晓朝译。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8年。
- [Plato. "Theaetetus." *Complete Works of Plato II*, translated by Wang Xiaochao.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8.]
- 让-雅克·卢梭: 《论语言的起源: 兼论旋律与音乐的模仿》, 洪涛译。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年。
- [Rousseau, Jean-Jacques. *Essay on the Origin of Languages: Which Treats of Melody and Musical Imitation*, translated by Hong Tao.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3.]
- 保尔·瓦莱里: "纯诗", 唐祖伦译, 《瓦莱里散文选》。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5年, 第298-306页。
- [Valéry, Paul. "Pure Poetry." *Selected Prose of Paul Valéry*, translated by Tang Zulun. Tianjin: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2005. 298-306.]
- 谢大任编: 《拉丁语汉语词典》。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8年。
- [Xie Daren ed. *Dictionarium Latino-Sinicum*.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88.]